契丹小字字源举隅

即　实

辽陵契丹小字帝后哀册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契丹文字的兴趣。六十年来，克服重重困难，走过曲折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内的研究，已经分清了大字小字。大字的研究，虽仍处于推断文义的阶段，小字的研究，则已进到辨识读音的阶段。《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它的成就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它使我国的契丹文字研究，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国外的研究，早已进入辨识读音的阶段，但是正确率似嫌偏低。《研究》一文从解释读汉语借词入手，拟定百余原字的读音，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则从字源与契丹词语方面作了初步研究，也有些微收获。

根据《书史会要》的记载和国内外学者近年的对比研究可以知道契丹文字原以汉字为本所制。既然以汉字为本，则其读音或意义必与所本之汉字有一定联系。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寻出各个契丹字迹，对于推断文义或拟定读音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契丹大字"皇帝"二字是移植的汉字，其读音与意义，当与汉字相同。"五月"二字也是移植，意义当与汉字相同，读音当是契丹语之［ɪɑwʊ ser］。""字当是名词与时位格助词之缀写，上半是日字原形，其义为时间单位之日，读音当是［ədur］；下半是时位格助词，其义为于，读音当是［də］或［tə］，正与"得"字音近。合之，其义为"于某日"。又如契丹小字字字源是，读音相同。字字源是，读音相近。

由此可见，探求字源很有意义。当然，寻索字源也不容易。本文就个人探索小字字源的一得之见，提出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先说表意字

契丹文字依据汉字制成。汉字表意的特点，给它留下烙印，是比较自然的事。所以，小字之中也有一些表意文字。

先讨论表意字。

与，字形相近。读轨，若来自，读音亦当相去不远。

之文义为大，似乎无大争论。辽的年号大安、大康之大，均用此字，即是证明。但因寿昌亦用此字，便将此字解为古汉语助词之惟①。愚意以为非是。义为大，则之义为寿。寿之大者，可谓寿昌。这大约是为了使译文合乎汉语的习惯。与正是寿昌一语不可分离之组成部分，若加分割恐怕难于成语表义。

这就象字本来是天德、乾统的组成部分，但因清宁、重熙也用此字，便觉"天"义难在其中立足，以为是附加之词，而把当作清宁、把当作重熙一样②。其实，前者之义为宁，并无清义（详见字解）；后者之义为熙，并无重义。义原为广大（参见拙文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契丹字源一斑”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3期），在重熙其义亦当为大。重则强，大亦强，其义可通。所以，译为重熙，还是翻译问题。

既知义为大，则可循义求音。女真语谓“大”曰〔ampala〕，满语则曰〔amban〕，蒙古语则曰〔jəxə〕。均与字源究音较远。

《道宗哀册》册盖有之语。此语曾被断为“大辽国天祐”③。但辽字音读无法坐实。此数语绝无“辽”之读音。而读“契丹国”则“丹”之音正与第二词之音相近而合。故应以契丹国解之。第二词之上两原字，依《研究》之拟音读〔tuan〕，下一原字我读为〔in〕，《研究》读为〔u〕。当是表示领属关系之助词。合之读〔duanin〕或〔tuanu〕。《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以下简称《行记》之“仲冬”，小字写作。仲者中也，蒙古语谓“中”曰〔dumda〕，是书面语，口语则是〔dund〕。女真语谓“中”曰〔dulla〕。可知契丹语之“中”〔duan〕或〔tuan〕，语源与蒙古语女真语同，而与蒙古语尤为相近。故又可知，契丹之丹乃是之音译。若然，则契丹之“契”必是之音译。“契”之古音为〔k'ei〕。正与字源究之读音相近。据此，可以拟定之读音为〔k'ei〕。

推定了字读音之后，回过头来与蒙古语之“大”〔jexə〕相较，则发现〔x〕与〔k'〕对应相通。而〔jexə〕之〔j〕居于词首，〔k'ei〕之〔i〕处于词尾者，当是元音移位所致。故可知蒙古语、契丹语之“大”，实是一词，只是由于语音演变，不加研究则无从识之耳。

合读之则为〔k'ei-duanin〕，除去末尾之领属格助词〔in〕，则其音不仅与汉语之契丹相合，而且也与蒙古语之〔xidan〕或〔kitan〕以及俄语之〔k'itae〕相近。关于契丹二字之含义，国内外学者虽有种种议论，但均未得其正鹄。

如前所述，义为大，义为中，合之则是“大中”。

现在说表音字

契丹文字基本上是表音字，所以，字数远远少于汉字，尤其小字，大约只有三百多个。

1，

当是契丹小字加符号之字。字则可能是汉字“各”之上半，故读音当与“各”字相去不远。加了符号之后，也应与“各”之读音相关。这种情形，我称为转制。

《行记》第5行有（以下称为“寅”）一词，前辈早已释为地支之“寅”，是。但以往的介绍、讨论文章，都将其第三原字写成，则非。第一，细看拓片便可发现是而非。第二，《仁懿哀册》第14行有二词，或是于寅时之义。若然，除上二原字应该互易左右位置外，第三原字当未抄误。两相校勘，可证作乃误，这是傍证。第三，之读音为〔kui〕。尾音是〔i〕。“寅”之第三原字尾音则当非〔i〕。若是字，则不合契丹语音。这也许是一条要证。故知此处非字莫属。

词之形义既明，便可循义求音。蒙古语用“虎”〔baras〕表示地支之“寅”。满语亦用“虎”〔tasxan〕表示。二者之第一音节均不与契丹文“寅”之首二原字之音相谐。《研究》已拟此二原字之音为〔xaɣa〕。愚意以为若读〔xaɣan〕，或许更能显出贯通一律。因为尾音是〔n〕，接助词，读〔kuanən〕，犹如接助词，读〔xaɣanan〕一样。所以，“寅”之首二原字略读之则是〔xa:n〕。故知契丹语若亦用“虎”表示“寅”，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但与蒙古语、女真语不同，则必另有一词。

《燕北录》云："番兵以蒌珍思为号，汉语熊虎二字也。"《说郛·重编燕北录》则云："番兵以蕃珂忍为号，汉语龙虎二字也"。二书之熊虎、龙虎均合言之，未析何为熊，何为龙，何为虎，原本即存疑案。

地支之辰，契丹小字为或，前人已经识出，《研究》又拟其音为［lu］。蒙古语谓"龙"曰［lu］，是契丹语之［lu］亦是"龙"。由此可知，"蒌珍思"之"蒌"，乃是之音译。"蒌"既是"龙"，则"虎"亦不难辨识。

然较二书文字，殊觉乖舛。蒌珍思，蕃珂忍，竟无一字相同，龙虎，熊虎又有部分不同。何以如此？细察其故，原来二书均有脱、误。

先来校勘"蒌珍思"与"蕃珂忍"。契丹语既谓"龙"曰［lu］，则"蒌"字不误。然除"蒌"字后，《燕北录》之"珍思"，便不与"寅"之首二原字之音相谐，可知"珍思"一语必定有误。与此相反，《说郛》只有蕃珂忍，而无蒌字，便少龙虎之"龙"，可知于"蕃"字之前脱一"蒌"字无疑。但，"蕃"字正与"寅"之首二原字之音相谐，故又可知，"蕃"字不误。从而可知，《燕北录》于"蒌"字之后脱一"蕃"字无疑。余下的问题是："珍思"与"珂忍"孰正孰误？我以为二者俱误。当作"珂思"才是。理由详后。二书之误盖因"蒌""蕃"形近而脱漏或误删其一；"珍珂"、"思忍"形近而误写或误刊。勘误之后，正文应为："番兵以蒌蕃珂思为号，汉语龙虎二字也。"

契丹语部分一经考核清楚，则汉译自然明了。龙虎为正，熊虎之熊为误。盖因熊字与龙之繁体形近而误。

至此，我们可以说："蕃珂思"即是《行记》"寅"字之音译。"蕃"的唐代北方读音是［xan］，正与"寅"之首二原字之音相合。进而可知，"珂思"则是"寅"第三原字之音。缘何不以"珂忍"为正，而以"珂思"为正？

第一，夭字加了符号之，《研究》读为［is］，不读［irən］。以此例之，"寅"之第三原字当读［kəs］，而不读［kərən］。

第二，与契丹语有亲缘关系之蒙古语谓"虎"曰［baras］，尾音是［s］，谓"山怪"曰［maŋgus］，尾音也是［s］。契丹语之"虎"很可能与［maŋgus］同源。故从语缘关系说，也极可能是珂思。

第三，正如本节开头所说，之字源是"各"，如果不错，除"珂思"之音可以相谐外，"珍思"、"珍忍"俱不相谐。故难以断为"珍思"或"珍忍"。

据此，可以拟定之读音为［kəs］。是则，之读音［xankəs］与"蕃珂思"之音基本吻合。其义为虎。这该是最有特色的契丹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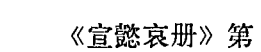
2，

字源当是字，这种情形，我称之为移植。，乙戛切，读轧。旧版《辞海》一解参以《六书故》曰："土密凝也"。据此解释，可知即今之圪字。今圪字读［gə］，北方口语则有称［gɑ］者。而轧字亦可读［gɑ］。二字读音相合。据此，之读音可拟为［gə］。是否正确？试作验证再定。

《道宗哀册》第四行有一语。前人已释其义为辛巳。我拟读为［ɣ'agɑ］，解其义为"白"。然则，契丹语之"巳"，读音如何？《研究》已经识出了卯辰午未酉戌的读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音，其中除未外，均与蒙古语完全相同。“未”，亦可视为相同，只是羊与山羊之别而已。因此，可以设想契丹语之巳亦应是蛇，山路广明已指出其词可能与蒙古语相同。循此推之，当读如蒙古语之蛇［mɔgo］或［mʊgɑi］。之音已拟为［gə］，之音《研究》已读为［o］，合之，即是［go］，与［mɔgɔ］之［gɔ］相近。虽然山路广明把拟音为［me］，我认为拟为［mɔ］更正确。随之，字读音也初步被证实了。

《宣懿哀册》第28至29行有之句。两句之两个形容词，音义不详。前一分句之第三词义为地土，前人早已释出，《研究》又拟其音为［noue］。愚意以为读［nowo］，无论与《辽史》之“耨斡”校核，或在其他情况下切读，都更合理一些。前一分句之第四词，有人释作清宁，我们解字时，已经认为不确。在此，处于“地土”之后。地，只能说宁，不可说清，由此可证，一词只有宁义，绝无清义。故释为地宁，应无疑义。与地宁相对为文的是后一分句之第三第四两词义应是“天清”，亦当无疑。然则，字可以表记“清”义。蒙古语谓“清、明”曰［gəgə］。既有“清”义，读音又是［gə］，可证二者同源。从而又次证明，读［gə］大致不错。依此言之，前引之句或可译为“正正地宁，爽爽天清”。由此可知，一语，实应译为“天宁”或“乾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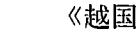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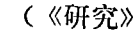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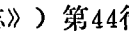
3，

当是契丹小字加符号之字。则当是汉字“侏”之省笔，读音当与“侏”字相近。加了符号之后，也应与“侏”之读音相关。

侏，莫败切，读卖。《东都赋》：“僸侏儒，罔不具集”即是。

前节已指出该读［mɔ］。［mɔ］正与侏之声母相同。且汉语之［mo］［mɑj］相通，陌，即有此二读，侏之声符末亦读［mo］。［mo］与［mɔ］音更近。所以，无论从字源方面说，或是从契丹语表示地支的语词大部与蒙古语相同这方面说，读［mɔ］都有理由，都可说不致大错。

哀册、墓志中屡见一词，其义为“圣”。至于读音，《研究》已拟读［u］、读［sun］。若读［mɔ］不错，则合而读之即是［mɔ:sun］。这又次证明读［mɔ］不误。

《越国王墓志》（《研究》称为《萧仲恭墓志》）第44行有一词，其义当是“撰之者”、“制之者”等等。此词之接，犹如《行记》一词之接，二者同类。说明二字的尾音都是［n］。这是从类比方面寻求证明。若从字源方面说，当是“孙”字草书之变。如果这个推测不误，则读［sun］，更有直接的理由。所以，一词我便读为［mɔ:sun］。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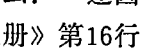
字源或是“亠尔”二字。当是组合而又损划之字。这种情形，可称为合省。“亠”，音头，字书不释其义。在我看来可能是个仓顶的形象。所以，读为头。“尔”，同尒，今作尔。二者组合时，可能是由于不便安排笔划，或是为了表示读音，省去“亠”之横，只留一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点，如果这个推测不错，则其读音当与字源“𠂇”字之读音相关。

《仁懿哀册》第5行有之语。其词义如何呢？经过一番对照研究，我认定它是“胡俚奚”。

《辽史》云：“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国语谓之胡俚奚。尊称曰赫斡麽。”

《仁懿哀册》第16行有之语。其义当是子皇子后。此语乃是汗与“胡俚奚”对举，益知此语非“胡俚奚”莫属。但此处语尾少了一个［n］音。故应音译为“胡俚吉”。阿尔泰语言中常有此种因语法关系而省或不省尾音［n］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词义并不发生变化。

《宣懿哀册》第10行有二词也是皇与后对举，只是“胡俚奚”词尾的［n］，换了另一原字。

三例“胡俚奚”，不仅用字不同，而且缀写法也有差异。两例连缀为一个书写单位，一例分作两个书写单位。依小字以词为单位缀写之规则推察，可知缀写之和为正。分写之为误，应作才是。根据“胡俚奚”一词的认定，根据之，之，《研究》已读为［ən］［i］，参以满语谓“妻”曰［turgi］，之读音当拟为［turk'］。这个读音也正好与字源“𠂇尔”之合音相近。

5，

字源当是契丹字之与，是转制组合之字。之读音《研究》拟为［tu］，我推测字源为“囱”。之读音未详，尚难确指其字源。然依有组成之含有［l］音，则含有［r］音之例推断，或许含有［r］或［l］音。依字之例，组合之字，读音当与二字相关。故之读音亦当如此。

《兴宗哀册》第25行有之语。其义当是“圆月”。蒙古语谓“圆”曰［tuguru］或［tuguriq］。若二者同源，则当读［turu:l］。这一读音正合对字读音的设想，正合《研究》对二字的拟音。据此，之读音似可拟为［tur］。

《仁懿哀册》第10行有之语，其义为诞日，早已有人释出。《越国王墓志》第6行有之语，其义为“于（某）日生”。二“生”字，前者作定语，后者作谓语、故形态不同。［turkun］［turkui］与蒙古语之“生”［turuxun］［turuxu］比较，不仅语源相同，形态也相近，而且对应相通。

6，

字源当是“公”字之行书体。故拟其读音为［kun］。此读音已在一词中初步经受检验。

《福留太师墓志》撰者名字之上有一词。按《研究》与本文所拟之音读之，是［sinkun］或［ɕinkun］，均与《辽史》之“辛袞”相合。关于辛袞之品位，《辽史》虽未确指，但已明言是乡官。此处辛袞之上起首两词是，按《研究》之拟音读之，可知是“沈州之”之义，可证辛袞是地方官无误。《辽史》又有官名“思奴古”。《语解》只说“官与敞史相近”。依其音，可以判定“思奴古”就是“辛袞”。

《仁懿哀册》第13行有之语。当与汉文哀册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之“旋殡于庆州北别殿”对应。首二词当是“庆州之”之义。“兴”、“庆”二字古音相近，故同用一字音译。“州”下之，当是格助词，与蒙古语之〔xi〕〔gi〕相同。次二词之音义不详。第五词与末一词，《研究》已释为“徙殡”，是。但第五词之原义当是“送之”，是及物动词。与不及物之“徙”有所不同，而与及物之“徙”则通。第六词，按《研究》与本文之拟音，当读〔kunɔn〕，其义当是“北”。蒙古语谓“北”曰〔xɔinɔ〕〔ʊmarɑ〕，前者与之读音颇近，而且〔k〕〔x〕二音对应相通，可知原是一词。第七词义当是“别”，读音可能是〔ɔ:〕。蒙古语谓“另、别”曰〔ɔndɔ〕〔obərə〕（口语则是〔o:r〕）。此〔ɔ:〕可能与〔ɔndɔ〕同源。若然，当读〔ɔ〕或〔ə〕。《仁懿哀册》是抄本，也许是之误，果然，则〔ə〕〔o〕相拼成〔o:〕又正与蒙古语之〔o:r〕同源。第八词义当为“于殿”，第一个原字乃是字之误，或是抄误，或是刻误。原石不见，暂难断定。

7，

字源当是“”字。是移植字。，闾育切、读陆。陆古读〔lig〕或〔lug〕。〔lu〕则是后起之音。若是移植，其读音理应相近或相同。

据《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可知，是“郎君”之意的“沙里”。我认为当是某一方音之拟写，亦是沙里、舍利。译之则是郎君。据此，“”之读音可以拟为〔lig〕。

8，

当是转制字。是则当是契丹原字之行书体。当由增益而成，其源当是“土”字。故、之读音，均应与土字读音相关。

《行记》第1行有之语，《研究》释为皇弟，甚是。既知其义，则可求索其音。“弟”，蒙古书面语谓之〔dəgu:〕，口语则是〔du:〕。满语谓之〔dəu〕。女真语则曰〔dəun〕。是三者之语源相同可知。据此，之读音似可拟为〔du:〕。

9，

当是契丹字损划而成，这种情形，可称为转制削损。据沈汇同志的意见的字源是汉字之伞④。它们的读音都应与伞字有关。之音值《研究》已拟为〔ts〕，若是字损划之字，则其读音亦必相去不远。

哀册都有奉敕撰之语。敕，契丹小字写作，早已有人识出。但尚未拟出读音。敕，蒙古语谓之〔ʧarlig〕，满语谓之〔xəsə〕。字，《研究》已拟读为〔k'〕，与满语之〔xəsə〕之〔xə〕对应相通。因此，设若读为〔sə〕，将与〔xəsə〕相合，且与契丹及汉字之伞的读音相关，比较合理。《研究》已指出：“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一个央元音 ə”。所以之音不是〔k'sə〕。而是〔k'əsə〕。而且〔k'əsə〕与满语之〔xəsə〕对应相通。

《越国王墓志》和《许王墓志》中屡见等词，《研究》释为“封”，是。这几个词的词根都是。《研究》拟为〔t〕或〔tə〕。以〔tə〕读之，则音〔təsə〕或〔təs〕，它与蒙古语表示次第之〔dəs〕对应相通，当是一词。若然，契丹语之“封”原是排就次第之义，“封”乃是引伸之义。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据此，之读音可以拟为［sə］。

10，

字源当是“月”，是增益而成之字。月，姥老切，读卯。暮候切，读茂。如果出自“月”字，其读音必有一定联系。

《书史会要》摹写契丹字云是“马”。看来这是大字。现大字资料中即有此字。由此可知，小字之，取自大字。是形音同取。因此，设读为［ma］。这个读音正与字源之“月”同声。

《许王墓志》第13行，48行均有一词，其中第二原字，《研究》已拟读为［pu］，依之切读，则是［mapu］。其义我们可以依音求之。《辽史·国语解》载：“马步，未详何官，以达剌干升为之。”又“麻普，即麻都不，县官之副也，初名达剌干。”从语言角度分析，“马步“与“麻普”，当是一词，是同名而异译者。“麻普”与“麻都不”，则非一词，“麻都不”与“马特本”，才是同名异译。“麻普”之义近于“达剌干”，“麻都不”之义为“知”或“掌”，与“敌烈麻都”之“麻都”，才是同词。故“麻普，即麻都不”云者，当是误解。从上列引文得知，“马步”、“麻普”，都与“达剌干”有关。“达剌干”之原义是“服众者”，渐转为“首长”之义。“达剌干”，史籍多记为“大人”。“麻普”。则记为“莫弗”或“莫弗纥”或“莫纥弗”等等，都是同名异记。

满语谓“老翁”曰［mafa］。正与“麻普”、“莫弗”相合。莫，一读［ma］；“弗”、“普”古亦相通。

由此可知，“麻普”之原义为“耆老”，渐而成为“首长”之义。这正与社会组织之发展过程相合。即是“麻普”、“马步”，其义原为“耆老”，辽代应相当于“达剌干”。

《许王墓志》第48行之下则是，合其义当是“老少”或“麻普郎君”。郎君，本义即是青年。因此可以说这是老少对举。

《兴宗哀册》第25行有之语。其义当是“长日”。第一词读［sunuma］。蒙古语［sunuma］是“可伸长”或“长长的”之义，是形容词。若契丹语之［sunuma］亦如蒙古语，则断为“长日”，可能不误。

［ma］在蒙古语中，有构成形容词的职能。从之例，得知契丹语似亦如此。这证明两种语言确有亲缘关系。这又证明，读为［ma］，可谓有故。

11，

字源当是“斗”，这种情形，我称为改形。

《许王墓志》志盖有一词，《研究》释其义为雨露之露，甚是。依《研究》所拟之音，应读［ʃou］，又据《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载《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音“得邻”，“邻”是舌音，即［dər］，则一词当读［ʃoudər］，正与蒙古语之口语近似，而［dər］这一读音也表明了与字源读音之关系。因此，可拟之读音为［dər］。

12，

字源较难确定，可能是“礼”字省笔变划或“仁”字增笔。

罗福成认为字义为“国”，其第一原字，《研究》已读为［xu］。其第二原字，

（下转11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Fang Kuei Li,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1977,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Bernhard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1940, Stockholm.

Mc Farland, Tai-English Dictionary, 195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王力《诗经韵读》，1980，上海

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布依语调查报告》，1959，科学出版社

王辅世《苗语的声类和韵类》，载《民族语文》1980年第2期。

梁敏《侗语简志》，1979，民族出版社

张均如《水语简志》，1979，民族出版社

梁敏《毛难语简志》，1979，民族出版社

王均，郑国乔《仫佬语简志》，1979，民族出版社

郑国乔《1957年仫佬语，毛难语词汇记音手稿》

石林《侗语概论》，东京外国语大学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22, 1981.

（上接60页）若是“礼”字省变，必与［l］音相关。蒙古语谓“国”曰［ulus］。用以例之，**兀刘**当读［xulus］。所以，**刘**之读音应拟为［lus］。

13，**力**

字源当是“内”字。是损削而成之字，即是削去了内字第一划与第四划。内，一读纳，故**力**之读音可能是［nɑ］。

《许王墓志》第3行有 **八夾 力业 / 村 出公 州欠 女村**之语。当是“国舅帐之”之义。首一词，《研究》已释为“国之”，是。乃是汉语借词“国”**八火**作定语时的形态变化。第二词，当是“舅之”之义。其第一原字若读［nɑ］，则与第二原字合读之音是［nɑʏɑ］，正与蒙古语之舅［nɑʏɑɳ'ʊ］之前两音节相同。因此，可以推断第三原字可能读［ɳ'ʊ］，若然，正与汉字“出”之古音相近。其字源可能是“出”。第四原字前已读为［kui］。四字合读即是［nɑʏɑɳ'ʊkui］。与蒙古语“舅家之”［nɑʏɑɳ'ʊxi］略同。第三词义当是“帐”。第四词义当是“之”。

此语既明，则第1行之**曲公 州欠 半村**三词，亦可知是“横帐之”之义。首一词之第一原字，《研究》已读作［kɔ］，依此读之，第一词应是［kɔkui］。

通过上述可知字音、词义的推断，一是根据字源，二是根据契丹词语，同时参以比较语言学的方法与逻辑推理方法。结论有以下几条：

第一，契丹文字确系依据汉字创制，其法除叶氏所说之“增损”外，尚有移植、截取、改形、转制、组合等等。其音其义与所本之汉字有一定关系。

第二，拟音释义应以契丹词语为据。若无契丹词语可据，才以其他语言类比。

第三，契丹小字可以称为准表音文字，因为虽有表意文字，但比重很小。也可以称为准音节文字，因为虽有多音节文字，但比重更小（关于音素文字问题，留待另文再说）。

第四，契丹小字的缀写与拼读，可能使用汉文的反切法。

注 释

① 《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② 《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③ 见《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④ 沈汇《试论契丹小字的创造与解读》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参见第51页。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